

党史「视角的」伟大工程

樊得智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明确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学习理解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对于进一步认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叫“伟大工程”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特别强调，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核心所在，进一步凸显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这里，毛泽东豪迈地、独具匠心地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工程”一词最早出自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他说：预想的计划在实践中变为事实时，“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就“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由此可见，“伟大工程”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系统性。

总起来说，毛泽东借用民族语言的“法宝”和现代概念的“工程”来比喻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既形象又生动，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把党的建设定位为革命的“法宝”“伟大的工程”，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是前所未有的，使全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80多年后的今天，“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法宝”“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是全党共识，成为推动执政党建设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重要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社会主义中国？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伟大工程“新”在哪里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不仅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工程，而且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经验，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就高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指明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要完成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它强调的是要提高革命的战斗力量。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里的“新”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人民要完成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现代化国家的新的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也都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时期，还提出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时期的“新”，都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伟大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突出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勇于自我革命。这实际上就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

总之，党的建设从“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提出及深化，彰显了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品质和政治勇气，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

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握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我们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必须推进“两个伟大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两个重要论断，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昭示了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在处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上，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只有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执政考验是所有考验中最大的考验，必须在“四个不容易”上过好关。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四个不容易”深刻揭示了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也深刻阐明了政党执政面临的执政考验。这“四个不容易”无论哪一方面做不到、做不好，都不可能长期执政。无论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还是现代执政党，丧失政权大多是在这“四个不容易”上没有过关。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其中执政考验是所有考验中最大的考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掌握好国家政权，必须为人民管好用好权力，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旦犯错误，就必定是颠覆性错误。

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真正做到“五个过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具体要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和“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再到把“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具体化为“五个过硬”，都充分体现了一点。这“五个过硬”既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寄予的殷切期望，又是对“本领恐慌”的及时提醒，更是一次触动心灵、提升境界的明确要求，也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基础标准。“五个过硬”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个“过硬”都有具体指向。最首要的在于信念过硬，最根本的在于政治过硬，最迫切的在于责任过硬、能力过硬，特别是作风过硬。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帅让衔

吴文珑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9月27日，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次评衔，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事关此后的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然而，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军衔后，不少元帅、将军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演绎了让衔的一段段佳话。

元帅让衔：元帅应该是他们的

在元帅中，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就提出让衔。徐向前让衔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他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过信。但是，毛泽东认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总指挥，他应当被授予元帅衔。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性格内向，从不夸夸其谈。正因为此，时任校长的蒋介石给他的评语是“资质平平”。但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作战中，给他领导下的军队屡屡造成损失。从参加广州起义，到领导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打破国民党三次“会剿”；再到长征中三过草地，带领部队血战河西走廊，徐向前的功劳有目共睹。但是在荣誉面前，他却不止一次说过：“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同徐向前一样，罗荣桓也提出让衔。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没有什么战功，而且入伍晚、贡献小。但是，毛泽东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至于战功，他协助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老战友，毛泽东很

看重罗荣桓对党的团结起到的作用，认为“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不许秘密搞鬼”。罗荣桓1963年去世时，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且写了一首“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悼词。另外，叶剑英也提出让衔。授衔之时，他因正在准备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所以没有参加授衔典礼。但得知要被授予元帅军衔后，他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军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他的理由是，自己长期担任参谋长职位，多是在后方工作，因此，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来的。但是党中央也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大将让衔：共产党人的一面明镜

除元帅外，在此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有不少提出让衔的，徐海东、许光达就是其中的代表。

十大大将中唯一没能出席授衔典礼的就是徐海东，他当时正在大连养病。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将军衔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听说中央准备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我请求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但周恩来却说：“考虑到你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

徐海东虽是窑工出身，但作战很勇猛。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一度视他为眼中钉，曾经用飞机在苏区散发过传单，上面写“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当赏洋十万”。和悬赏彭德怀的金额一样，可见徐海东的分量。作为张国焘的老部下，他顾全大局，在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

关键时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难能可贵。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但就是这么一位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在名誉面前也提出让衔。

另外，许光达也提出让衔。得知自己拟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他对贺龙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我均不如。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后来，许光达还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降衔申请”。信中说：“我们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看了“降衔申请”后很感慨，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当然，考虑到许光达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党中央没有同意他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中将让衔：授予校官就不错

中将方面，徐立清、孔庆德是让衔的典范。徐立清一再表示，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命运、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紧紧联系起来，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这些生动事例，充分体现出老一代革命家淡泊名利、为民谋福的崇高风范和拳拳初心，值得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模范践行。

徐立清1952年被评为正兵团级。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正兵团级应该授上将军衔。但徐立清坚决不同意，他利用在总干部部管理授衔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已经列入上将名单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写到中将名单当中。罗荣桓看到他修改过的名单后，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写到上将名单中。但徐立清仍不放弃让衔，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说：“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

徐特立的初心之路

叶松

教育界，希望“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徐特立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学校向劳动人民敞开；反对把学校当成政治投机的资本，也反对把学校当作私人产业，从中牟利肥私。他常说：“我平时最喜欢贫苦学生。”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徐特立将“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后来，他在《六十自传》中写道：“长沙县（包括现今的长沙县和长沙市）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1919年9月，42岁的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到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才回到祖国。

投身革命，成为坚强的老战士。名誉、地位、金钱并不能阻挡徐特立前进的步伐。这时，他的教书所得已十分可观，“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丰厚的收入并不能解决理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徐特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最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富国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

国，为穷人做好事”。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在毛泽东建议下，徐特立回到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令他惊讶的是，曾经熟悉的家乡完全变了模样，天朗气清、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徐特立一边赞叹妇女和儿童的伟大，一边感慨地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让徐特立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信仰再也没有发生改变。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老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总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坚守初心，尽心竭力建设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在常人看来似乎可以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并没有丝毫懈怠，而是坚守初心，尽心竭力地投身新中国建设。自新中国成立到徐特立逝世的近20年中，他以身作则、勤勉奉献，为中国教育事业

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彭德怀知道后，多次找徐立清谈话，要他接受上将军衔。但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毛泽东感叹地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如此！”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恩来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除徐立清外，1930年就入伍的老红军孔庆德也摆正了名利、地位与事业的关系。评衔工作开始后，有同志打电话征求他对自己军衔评定的想法。他表示：“评衔问题，我个人意见是服从上级，给个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在孔庆德看来，军衔事关个人荣誉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想法，但关键是从什么角度去想、怎么想。级别上去过大了，肩负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一个人只要想到这些，自然就不会去计较、更不会去争军衔的高低了。

军衔和勋章，既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卓绝革命生涯的肯定与奖赏，又是一块试金石，见证着共产党人在功名利禄面前的抉择。他们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命运、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紧紧联系起来，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这些生动事例，充分体现出老一代革命家淡泊名利、为民谋福的崇高风范和拳拳初心，值得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模范践行。



史海拾贝

做了大量工作，实践了他“尽瘁此心血”的誓言。

进入北京后，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他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在繁忙工作之余，他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与世长辞，享年91岁。逝世前，他留下遗言：过世后，把遗体献给医学科学部门。至此，徐特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践行了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初心。徐特立逝世后，毛泽东在审定悼词时亲笔加上“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高度赞扬了他不平凡的光辉业绩。



党史

人物